

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

论新时代文学与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邱海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是新时代文学的新课题

国家形象是特定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国家行为与活动在国内外民众和国际社会心目中形成的印象和评价,影响着综合国力竞争、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合作发展等。针对塑造、展现什么样的中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

塑造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贡献相符的中国形象。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种状态,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前,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个人类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有效的对话建立于平等的交流与协商

——“文明书写与文明互鉴”高峰论坛综述

由四川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文明书写与文明互鉴”高峰论坛近日在线上举行。四川大学校党委书记甘霖、副校长姚乐野,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江、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部主任张跳、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武汉大学教授李建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四川大学特聘教授西奥·德汉等参加论坛,围绕“中国阐释与文明形态”“中国视角与中国价值”“文明书写与中国智慧”“东方视野与西方声音”等四个主题进行讨论。

甘霖以“因循而变”为题谈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深刻演进。在诸关键变量中,中国的崛起及其走向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问题,政治经济只是其表象,文明文化则是其里。从文明文化的深层、长程坐标观察中国问题,尤为必要。他以《大学》为例,认为中国的传统经典是有当代价值的,并且蕴涵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数千年历史中,对传统经典的阐释有其规律可循,可谓“因循而变”,还会因时代的需要通过新的阐释而实现文本的功能再造。

曹顺庆针对“重写文明史”问题提出,人类历史已经进入新的变局和多元格局之中,我们必须对世界格局和文明互鉴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有更为主动、更有分量的发声。应当用人类文明互鉴的事实,批判文明冲突论,打破“西方中心论”和各种文化偏见。“重写文明史”就是一次主动发声的机遇,中国学者应借此言说自身的文明观、书写自身的文明史,由此延伸到各个学科史,构建文

明新话语,献策于当下的文明互鉴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张江以《说文解字》为基础,对汉字“阐”的丰富意蕴进行挖掘。他认为,唯有打开隔障,互开相放,建构合理之主体间性,阐释方有可能。个体阐释必须求之于公众承认,在争取公众承认的过程中确证自己。所谓的对话,应当是主体之间平等的交流与协商。正当之阐释,应以建构平等对话为目的,通过对话,实现交流,完成阐释。

张福贵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文化自信”为主题谈到,“文化融合”的重要前提在于不回避文化冲突的事实和不放弃政治斗争的需要的同时,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创造“和合文化”环境和机制。越是分裂的时代,越要强调统一,越是多样性越要看到其背后和未来诉求的一致性。新形态具有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外来文明、革命文化与改革文化的融合性特征。王宁聚焦以“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正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因此世界文学叙述也应该是“复数的形式”。我们应当建构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并更深刻地参与到世界文学研究的国际讨论之中。张跳从文明互鉴视角重新审视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价值与局限,认为萨义德的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在东方主义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这对于我们在学理和历史层面冲破西方文化霸权,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历史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对文化认同的流

探索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文学路径

国家形象不是一个固化的概念,受到本国历史地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际舆论等因素影响,国家形象不一定与国家发展变化同步、相一致,这往往会导致产生不必要的误解、隔阂。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更加频繁,文化上的相互理解解构成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与纽带,相反,文化的差异与误解就会造成交流的障碍乃至冲突、斗争。文学作为文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载体。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中国网络文学海外输出成果显著,覆盖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这些都表明中国当代文学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面对蒸蒸日上的伟大时代,面对气势磅礴的现代化实践,面对异彩纷呈的小康生活,新时代文学工作者要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态度破题解题,善于从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催生更多传世之作、扛鼎之作,以文载道,以文化人,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出文学贡献。

紧扣“可信”,讲好中国故事。“可信”来自真实。第一方面是“故事的真实”。中国故事,中国方案最独到之处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

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更多更新的鲜活素材。新时代文学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善于讲好恢宏大气的国家故事、丰富多彩的百姓故事,以大视野、多角度呈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第二方面则是“艺术的真实”。中国故事、中国经验最迷人之处在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风靡世界,源于国际社会关切红军故事、长征故事、延安故事,也源于毛泽东同志等以“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讲好故事。新时代文学要善于把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价值转化为精彩的中国故事,担当负责、多姿多彩的中国,提升国际对中国的认知度和美誉度。

紧扣“可爱”,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可爱”来自美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再到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也对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民族的心灵史,能让远隔万水千山、身处天涯海角的人们从字里行间读懂一个民族、领悟一种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新时代文学注重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相融合,找准世界发展的利益交汇点、中外价值观的契合点、人类的情感共鸣点,以新的创意思维、新的题材内容、新的表现手法,构建新时代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民审美情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世界,更加有效地传播中国理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紧扣“可敬”,刻画时代新人形象。“可敬”来自担当。亿万勤劳勇敢、担当有为的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形象的“代言人”,就是中国形象的使者。鲁迅先生曾经深情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作为历史内容主体的人类行为,是其理念、意志、思想和情感的产物。任何历史时期,都有反映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时代典型。文学以审美的方式反映一定时代的价值和价值体系,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实现的。文学意义上的“新人”是时代精神的人格化。“新人”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学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而言,“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最大的底气和最强大的动力。新时代文学要在创作内容和对象上,让人民群众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书写生旦净末的人间史诗,善于从生动现实中发现新的人物类型,灌注新的精神气质,塑造新的人物形象,体现新时代的审美理想和崇高追求。通过塑造新人形象,让“中国人”群像丰盈新时代文学的形象画廊,让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时代风貌闪耀世界。

新时代要唱响新征程的奋进之歌。新时代文学工作者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思想的深度、艺术的高度、感情的温度开辟新时代文学气象万千、群峰耸峙的壮阔境界,使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通过文学得以生动展现。(作者系广东省作协副秘书长、一级调研员)

□黄尚恩

动性和世界性的一味宣扬,容易导致无视文化认同的民族性根基,最终可能走向虚妄的境地。

彭玉平以“文明的双重书写:文学史与学术史”为主题,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回溯提出,无论是文学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都是以文学性为基础和前提。中文学科的底色,是以文字、语言支撑起来的文学性,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书写中,坚持对文学性的关注,有助于遏制批评当中的虚无之弊。

李建中以“文明书写与兼性智慧”为主题,结合《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宗经》等中华文化典籍,阐述了“兼”字背后对应的传统文化基因——兼性智慧。他认为,文明书写的一切要素皆贯通于“道”:作为形而上的“道”(理性和观念),作为形而中的“道”(方法和技艺),作为形而下的“道”(文本和物态)。

胡晓明以钱锺书作为文明互鉴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典范,认为钱锺书以超人的博学和丰沛的活力,创造性地打通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地活化传统经典。当然,每一个学者都可能存在自己的时代局限性,这更加值得我们警醒,在做研究的时候,应当参照各种不同的观点,客观地了解,深入地探求。当今文明互鉴,更须博识精思。

西奥·德汉通过回顾撰写《文学:世界史》中欧洲文学史章节时的经验,分享了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全球化和行星化的问题,正在决定性地改变着整个文学景观和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而作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者,我们的任务在于阐释这些变化和

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是在舆论媒体上流传多年的一句老口号。伴随着这口号,确实已有很多样式、很多形态的中国文化走了出去:餐饮、瓷器、影视、书法、国画、服饰、工艺品,还有杂技、功夫、中医和舞台表演艺术,以及关于旅游名胜和历史古迹的种种言说和故事。文学在这之中,算是相对抽象、相对深沉,也相对不那么热闹、不那么容易赢得可观的人气和火爆现场效应的一个小众品种。尤其是隔了语言文字的鸿沟,能够直接阅读和欣赏我们中国文学作品的域外人士,远不及吃中餐、穿唐装、看杂技和学书法、练功夫的人那么多。

文学的跨国越境传播,必须穿过语言的种类界域,同时又必须携带、保留由特定的语言传统而来的那份独异的精神韵味。哪怕仰仗了翻译,在归化总做不到百分之百,而异化也总不可能彻底排除的跨语际转译过程中,真正显示翻译作为一个事件或一项实践的那点根本价值的,恰恰只能是对于异质的意义、异样的体验、异己的语用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导入和引进。如果不是这样,翻译就像是在语言和精神的世界里,听着门外的吆喝,而翻腾自家的箱底,挑拣可以兑换现钱的旧物件似的。对自己,充其量都只是发掘既有存货里的残余价值。其实这已不能算是翻译,至少是不属于鲁迅所说的那种可有“窃火煮肉”之用的翻译。最多只能说这是一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或者借题发挥、趁虚敷衍的新形式。

各国各种语种的文学跨界越境旅行,实际上的状态,往往却多以此种做起来比较容易、效力也比较明显的形式最常见。通俗的大众化、类型化作品总是占据着各国文学翻译中的大宗地位。也正因此,非通俗、非大众化的作品,必须先瞄准或先找到自己跨国越境传播的特定受众群体,然后才谈得上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效的介绍,包括作品本身完整、准确的译介,也包括与作品相关的时代背景、话语形态和社会意义赖以生发及获得理解、认知的文化情境的译介。这正像对水土条件要求苛刻的奇花异草,在移植外地时,需要更多地考虑把有助植株根系存续生机和活力的土壤成分与酸碱、温湿度等因素,都一概附着给予保障。

换句话说,在文学跨国越境的传播与接受中,通俗化和大众化程度比较高的一类作品,适应不同文化语境和社会土壤的能力也会比较强。因为他们原本表达和包含的就是超越或连通在国家、种族、语言、文化和媒介疆界之上的那些共感、共情和共识。在表达的出发点上,它们就没有多少立足于某一确定的国家、种族、语言、文化方位或社群和媒介层次的特殊意识,所以整个作品最终呈现出的风貌和内容,也就具有一种不受国家、种族、语言、文化、社群和媒介差异阻隔的性质。而通俗化、大众化程度不高的一类作品,既在国家、种族、语言、文化、社群和媒介层次上占据了明确的定位,那么,对于它们的理解与认知,顺理成章也就需要牵连到国家、种族、语言、文化与社会等各方面背景的精准把握。

在当下中国,一如新文化运动与百年前文学革命兴起之初的情形,纯文学或所谓严肃文学的受众,主体仍在于青年。而且这部分青年,又以高校文科各专业所集纳的在校者为重。尽管从常年执教文学课程的不少一线教师的直感来讲,即便是在正就读于文学专业的大学生中,阅读文学经典和文学新作的人数及频率,也较之理想指标或期待数据有较大落差。但纵使如此,谁又能设想,在文学本真的话语场和影响力已从极大社会生活空间里严重收缩的今天,还有别的那个群体能比大学里在读的文科生更认真、更细致,也更深入地去关注、阅读、并且体察文学作品中的一切。一百余年的奋斗,一百余年的发展,精英文学的大本营和根据地,依然在学院文化和高等学府里相对安静的一角。

四年前,我随北京作家协会代表团访问欧美,在巴黎龚古尔兄弟故居,也是今天巴黎“文学与作家之家”的办公地,与巴黎的几位诗人和出版家见面交流。一位有名的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白发苍苍、气质优雅而又谦和的长者,在谈话末了,忽然小心翼翼地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作家‘某某某’是不是还在进行文学创作?”乍听之下,我们一行人甚觉奇怪。再一聊,才知道这位老出版家早在1980年代就曾策划出版过这位中国作家小说集的法语译本,不过之后30年再没有机会获悉他的消息。现在见了北京来的作家,忍不住打听一下。而那些天,实际上正有一场中国书展在法国举办,好几位中国作家(包括法国老出版人所关注的这位中国作家)都应邀出席,国内的主流文学媒体都作了报道。

当时,我的感慨是:我们自以为很强势、很显眼的许多对外文化、文学交流活动和相关的新闻报道及宣传推介讯息,散播、折射到国外自有其明暗强弱、流脉节奏和能见度配比的社会舆论总体格局中,或许常常只是微不足道甚至无人瞩目的一丁点儿泡沫。就算在文学这同一名目所指涉的社会行当和社会话语的圈子里,一位法国的文学行家,接连二三十年不特别去关切、搜罗一下他一度感兴趣的一位中国知名作家的消息,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和我们不会主动去追踪了解某一位在法国当代文坛名声响当当的作家,也没什么不同。没有任何“他者”的存在或介入的文学生活世界,无论对于那位巴黎的资深文学出版家,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在中国以文学为业的人来说,都是正常的,也都是运行无碍、出入无虞,满可以自给自足、自圆其说、自成一体的。

但文学本有和应有的天地,分明并不止于此。就像门窗外偶尔会响起的那一两声呼唤或吆喝,虽然我们总在我们无意间,但一旦来了,却也总带着几分似乎就是特地冲我们而来的刻意和必然,突袭似的探询、质问或扰动着我们的常识和习惯。这样的时刻,无法避免,也无法杜绝。这也正像我们在最平淡不过的生活常态间隙,也会偶尔出门远行,带着我们的文学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或邂逅它们小众的知己。这种接受虽然小众,但却可能直抵心灵,产生持久的影响。

在这部定名为《当代中国实力派作家国际名片》的书稿里,近年活跃于中国文坛前沿的八位分别主攻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和诗歌等不同体裁的实力派作家——宁肯、徐坤、祝勇、周晓枫、星河、史雷、石一枫、李成恩,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在小说、散文创作领域都取得了突出实绩的著名作家史铁生,展现了各自的文学履历和代表作概况。有关素材,都来自作者本人或其家属。撰写这些文稿的,则清一色是大学在校生,中文初稿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和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写出,英、法、德、俄、西、朝六个语种的译稿由相应语种的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外籍学生及教师完成。在作家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上,这些年轻的翻译者都尽力在文稿中表露了他们对于作家作品的特别理解。

作为一所以语言人才的培养为传统特色的大学里的就读者和任教师,他们都懂得:在确定的素材和内容框架之上,叙述、阐释性质的语句措辞本身,也会“说”出自己的一些“话”来。甚至更进一步,在介绍和评述的行文语句里,意义是同时体现在介绍、评述的对象和介-评述的形式中的。期望这些当今中国文学的主体受众中的作者和译者,通过这本书所传达的他们对于史铁生、宁肯、徐坤、祝勇、星河、周晓枫、史雷、石一枫、李成恩这九位作家的描述和认识,在英、法、德、俄、西、朝各语种文学和海内外华文文学的广阔空间里,都能遇到同声相应的知音。(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跨国越境的文学传播及小众接受

□李林荣

